

传统电视片助力古籍活化利用的新启示

□ 王俊双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长期以来,古代典籍对大部分人意味着内容深奥、语言晦涩、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似乎只有专业的学者才能够了解其中的奥秘。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①。如何“唤醒”古籍里的文字,让古籍中丰富的知识、优雅的艺术、深邃的思想在新时代重新绽放光彩,成为古籍从业者们不断探索和努力追求的目标。一册册古籍通过创新利用手段、依托新型技术、借助各种载体,化作美丽的图片、有趣的音频、生动的视频,“走出”重门深深的库房、安静冷清的阅览室,走入人们的视野,走近人们的生活。

在古籍活化利用的种种形式中,电视片是重要一类。电视片最早专指供电视台播放而拍摄录制的片子。现在的电视片,其播放渠道已扩展至网络电视、视频网站等各式各样的新媒体平台,不过从内容与形式上来看,仍然保留了传统电视片的特点,多为一系列相同主题、内容连续的中长视频。近年来,专业电视片制作机构联合古籍专家、业内学者、各级图书馆和文保单位推出了不少优秀的古籍类电视片,在观众群体和古籍业界均引发了热烈讨论,为我们思考如何利用电视片这一传统形式赋能古籍活化利用提供了成功案例。本文结合古籍类电视片在古籍活化利用领域的优势,分析其选题与内容特色,以新时代古籍工作开展为背景探讨古籍类电视片的发展前景。

一、古籍类电视片的特点与优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古籍活化利用在不断创新中迎来跨越式进步,呈现方式丰富多样。既有传统的文化节目、影视片、纪录片通过新型制作技术大放异彩,也有微信公众号、移动应用、专业网站、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渠道助力古籍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更有以IP开发为核心的各类文化产品、数据库、智慧平台、虚拟社区、交互体验等新型活化利用方式,让古老的典籍以崭新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这些各具特色的古籍活化利用形式中,主题鲜明、连续性强、时长充裕、内容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古籍类电视片在深化古籍传播的内涵和品质方面展现出特有的优势。

(一) 主题连续、立意明确

电视片的制作往往围绕特定主题展开,以多集视频的形式组合呈现,各集视频从不同角度或以不同题材对该主题进行演绎,形成主题鲜明、连续性强的一组系列节目。同时,电视片在设立整个系列节目的主题之外,各集均有较为明确的立意和表达诉求,并非仅仅是相关

^①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8013.htm?rsv_upd=1 (2024.03.30 检索)。

知识的串联。电视片制作本就需要“主题先行”，系列电视片中的各个单集不仅需要符合系列节目的大主题，同时还需要在一集的范围之内讲述完整故事、阐发故事意义。古籍类电视片在介绍古籍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往往还会从古人智慧、文化遗产、古籍保护、学术研究等方面对主题进行延伸、深化。

以近年引起广泛讨论和关注的《穿越时空的古籍》《典籍里的中国》为例，《穿越时空的古籍》聚焦以不同的古代典籍为研究对象的各领域专家，通过他们的探索过程和研究成果重现古籍所蕴含的“穿越时空”的文化价值与现代意义；《典籍里的中国》则以对话和戏剧的创新形式讲述中华优秀古籍的成书与传承故事，挖掘这些故事背后的文化知识和传统智慧。2019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启动《文津博古》电视片制作项目，该项目选取国家图书馆馆藏经典古籍为代表，以馆员宣讲的形式介绍馆藏文献及相关情况，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对馆藏古籍起到了宣传作用。《穿越时空的古籍》共有9集，《典籍里的中国》两季21期，《文津博古》共有10集，均以明确的制作主题和核心关注点贯穿始终，从而使得这些古籍类电视片主题鲜明、特点突出。

（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古籍类电视片由多集视频组成，从单集制作时长上来看也比通常只有几分钟的短视频更长，充裕的制作时间使得古籍类电视片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能够达到相当高的丰富度。《穿越时空的古籍》全系列共9集，既有敦煌文献、家谱、东巴文献等特殊古籍类型，还有从古籍内容层面关注古籍中的美食、图画、古代妆容与服饰以及古籍实体层面的字体艺术与修复技艺，专业领域跨度极大，在立足典籍的同时引入书斋故事与考察记录，形成保护、传承与创新的逻辑互嵌^①，使得节目内容不再只是单纯的知识介绍，形成一组题材多样又相互观照的古籍类电视片。《典籍里的中国》每集长达95分钟，在一集之中不仅能够深入挖掘古籍内容，还可以充分调动影视化的叙事结构、多元场景和时空穿插、创新的试听语言等各种新型展示形式^②，通过传统访谈与剧场表演相结合的制作手法增加趣味性、观赏性、互动性。

与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传媒手段相比，电视节目虽然稍显传统，但其丰富的内容和多变的形势，让传统电视片具有极强的创新空间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生态。而且，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电视片无疑为观众提供了更加丰富、全面、系统的知识场景与更易沉浸的观看体验，电视片的观看不再是匆匆划过手机屏幕的碎片化知识获取，观众能够真正地跟随电视片的展开思考电视片制作者传达的意义。相较于碎片化的知识获取，电视片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也更容易制造话题度和热点，在文化宣传和知识传播方面都有突出优势。比如《典籍里的中国》在播出后就引发了极大规模的讨论，获得近150个热搜，第一季全网话题阅读及播放超过60亿次，第二季全网播放超16亿次，微博相关话题阅读超52亿次^③，可谓是传统电视片的高品质叠加新媒体传播力量的极佳案例。

^①张兵娟、李阳：《中华古籍文化传播创新的日常面向——以纪录片〈穿越时空的古籍〉为例》，《三明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第31—37页。

^②刘子涵、郭玉真：《〈典籍里的中国〉：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发展新路径》，《视听》2024年第2期，第96—99页。

^③申晓娟：《从小众到大众从冷门到热“典”——新媒体助力古代典籍活化利用》，《新世纪图书馆》2023年第11期，第5—9、23页。

二、古籍类电视片的选题策略与内容创作——以《文津博古》电视片为例

优秀电视片的诞生离不开节目构思、主题设定、选题方向、内容创作、素材收集、拍摄制作等各个环节的精益求精，而主题选定事关电视片的整体基调、中心立意和主体内容，优质选题对电视片的整体效果至关重要。电视片的选题既要保证丰富而充实的内容创作空间，还要紧扣主题的重点与亮点，同时需要注意系列节目的整体效果。

以《文津博古》电视片制作项目为例，该节目共10集，每集选取一种或一类国家图书馆馆藏古代典籍作为主题，分别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赵城金藏》《宫廷写本金刚经》《说文解字》《徐霞客游记》《芥子园画传》《〈农书〉与活字印刷》《本草纲目》《王阳明专题文献》，形成了以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为主、配合各领域代表性经典古籍的选题结构。

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指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文津阁《四库全书》，从文献价值、历史地位、学术意义等方面来看，四大专藏都可称之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在《文津博古》电视片中，《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均分上下集予以充分介绍，敦煌遗书则选取了宫廷写本《金刚经》，以点带面进行展示。此外，《文津博古》电视片还从文字、地理、艺术、技术、医学、哲学等不同方面选择代表性书籍，比如以《说文解字》为语言文字类书籍的代表，以《徐霞客游记》为地理类书籍的代表，以《本草纲目》为医学类书籍的代表，尽可能囊括不同学科领域的古人智慧和传统文化，形成知识结构上的“博古”，还汇集了国家图书馆所藏古代典籍精华，亦是馆藏特色的“博古”。

《文津博古》电视片项目立足国家图书馆馆藏古代典籍，旨在传播知识与文化的同时宣传馆藏文献，因此，相较于其他古籍类电视片，《文津博古》电视片增加了典籍的版本源流、入藏过程、书籍制作工艺、古籍传承与保护等不少新的内容。

以四大专藏的各集为例，四大专藏在不同时期如何入藏的过程是电视片的重要内容。盛世修典，乱世书厄，典籍的失散与重聚无不与家国命运紧密相关，书籍聚散背后的故事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真实反映，引人深思。前代学者和图书馆前辈们为保存典籍鞠躬尽瘁、不懈努力，才为我们换来一册册珍贵古籍留存至今，他们在困难年代为了书籍事业不计代价、孜孜以求，更是令人感佩。再以《本草纲目》这一集为例，电视片介绍了李时珍的生平与著述，从中医学发展的角度说明《本草纲目》的特点和价值，此外还讲述了《本草纲目》早期版本的成书、刊刻出版曲折经过，并配以重要版本的书影，反映出明中后期书籍出版业的发展样貌。

明确而深刻的主题、丰富而多样的内容，是电视片制作的重要目标，也是电视片不同于其他传媒形式的优势所在。《文津博古》电视片在选题和内容上的最大特色即在于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并由此引入文献学和书籍史等较为专业的视角，深入浅出，将专业知识融于趣味性的故事之中，成为与其他古籍类电视片相比别具一格的亮点。

三、古籍类电视片的发展前景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①作为古籍资源转化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古籍类电视片应充分利用其主题深刻、内容充实的优势,同时注重多元化传播渠道的建立,在确保电视片的品质与内涵的基础上扩大影响力,在新时代古籍工作中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

(一) 着力内容创新

电视片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特性使其能够对主题进行充分呈现,古籍类电视片不能满足于平面化地介绍古籍内容与价值、作者的生平与成就,而应该将其看作承载中华文化和民族记忆的重要实体,从文化传承层面重新审视其价值与现代意义。古籍类电视片的主题和内容既要遵从古代典籍的自身特点与基本原则,又要打破传统学科的思维桎梏,将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相结合,聚焦古籍方方面面,细化主题,创新内容,为观众提供多维度、更全面的古籍相关信息,吸引更多观众来“接触”古籍、了解古籍、爱上古籍,让观看古籍类电视片成为当代人“对抗阅读焦虑”^②的有效方式。

比如当前古籍类电视片的主题多源于对古籍内容的挖掘,而对作为物质实体的古籍的制作工艺、装帧形式、版式风格、流通方式、阅读习惯等方面关注较少;就古籍类型而言,不仅要重视历代经典,对于那些虽不属于经典但亦能提供知识与趣味的古籍也应给予关注,甚至还可以立足现代人生活反向关照非经典古籍的价值,而非仅仅从经典古籍中寻找现代意义;再比如古籍类电视片往往限于一种书籍或一类书籍,对于古代书籍诞生与出版的整体环境颇为忽视,而在知识资源较为匮乏的古代,书籍出版与文化发展可谓紧密相关,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在时间和空间上将古籍还原至历史场景之中,为今天的地域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古籍类电视片的主题细化、内容创新既要充分借重于古籍相关专家学者,也要积极发动各领域专业人士共同参与。《穿越时空的古籍》《典籍里的中国》的制作均聘请了古籍相关专家作为顾问,并与国家图书馆展开密切合作,古籍相关专家学者不仅能够从内容和形式上为电视片制作提供内容、把关质量,还可以引入更加丰富细致的视角;而如何将准确、专业、细化的内容呈现出来,则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引发现象级讨论热潮的《典籍里的中国》即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话剧院、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图书馆等各领域专业人士强强联手的成功案例^③。

(二) 优化传播渠道

电视片受到时长和视频形式的限制,传播灵活度稍显不足,对特定观众群体的依赖较多。如何让制作精良、内容丰富的电视片为更多人看到,是电视片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以《穿越时空的古籍》《典籍里的中国》《但是还有书籍》《古书复活记》等为代表的优秀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4/11/content_5684555.htm (2024.03.30 检索)。

^②姚刚:《古籍文化的大众传播——以近年来古籍题材纪录片为例》,《中国电视》2022年第12期,第96—101页。

^③慎海雄:《我们为什么要策划〈典籍里的中国〉》,《中国广告》2021年第4期,第99—100页。

古籍类电视片不断涌现，营造了非常好的观众基础，以此为契机，增加古籍类电视片的宣传力度和传播渠道，将会有事半功倍之效。

传统电视片的播放一般局限于电视台，虽然现在的电视片的播放多以网络电视和视频平台为主，但仍然未超过电视片的传统播放形式。想要打破电视片的传统渠道，一方面可以积极与文化机构、文博单位、业外场所等谋求合作，增加播放窗口；另一方面，尝试将电视片播放转化为多元传播渠道，组合出击、互为宣传，比如充分利用已有新媒体矩阵，增加直播形式的主创访谈，研发电视片主题周边文化创意产品，配合展览、讲座等实体场景，推动互联网时代“乘数效应”的积极意义，将优质电视片推送给更多潜在观众群体。

如何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意见》指出：“做好古籍普及传播。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度，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加强古籍题材音视频节目制作推介，提供优质融媒体服务”^①。以新时代古籍工作特点与重点为指导，着力内容创新，优化传播渠道，古籍类电视片将会在古籍资源转化利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4/11/content_5684555.htm (2024.03.30 检索)。